

1962年的“逃港风波”



当时逃港人群不听劝阻，盲目地成群结队而去。

(资料图片)

广东省深圳市最新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深圳早在40多年前就尝试对外开放。1962年4月，在深圳（当时叫宝安县）正在进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一股逃港风波也突然袭来。原宝安县第一书记李富林表示，从中共建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逃港一直屡禁不止，但1962年出现的大规模逃港风波来势汹汹。

1962年这次逃港风波，共有10多万人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涌入深圳，6万多人偷渡出境。这场风波惊动了周恩来总理。

10万人南下深圳掀起“逃港潮”

现在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深港边境曾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逃港风波，第一次是1957年6月底至9月底，历时3个月才基本平息；第二次是1979年深圳建市不久。但深圳市最新解密的资料显示，1962年，在深圳尝试对外

开放的时候，有10多万人来到深圳要到香港去。

这次逃港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比较大，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共10多万人次涌入深圳，51395名来自12个省、62个县市的外逃人员被收容遣返。

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错误地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他们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宝安县公安局的调查反映，当时逃港人群普遍存在“不过黄河心不甘”的思想，不听劝阻，盲目地成群结队而去。5月13日沙湾

有逃港民众4000余人，警方对其中200多人做了规劝工作，但仅6人愿意回家。

大学生当总指挥持木棒强行冲关

1962年4月29日凌晨，边防哨兵向宝安县公安局反映，有批人聚集在梧桐山。宝安县公安局抽调6名干部、边防警察支队抽出两人组成调查工作组，配合当地一些民兵积极分子共14人扮成外流民众，分成两个小组，分别进入梧桐山进行摸底。

经过一天一夜调查发现：聚集在梧桐山共有3批人，约达400人。第一批到达的有300多人，绝大部分是惠阳县淡水地区人。他们说，从淡水到达梧桐山已经过了3个晚上，他们有组织、有指挥，总指挥的是一名大学生。到下午6时多，这班人就逃往香港新界方向去了。另两批人从横岗方向上山，这两批人共100多名，除了小部分是惠阳、广州等地人外，其余大部分是海陆丰、潮州等地人。他们走了几天路才来到梧桐山，准备在当晚越过新界去……

调查组最后形成的报告显示，这几批人大多数是17至40岁的青壮年，有男有女。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他们的总指挥说：“在冲到边界时，有人要阻挠我们的话，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

逃港风波惊动总理 广东省委组织遣返

到港民众的增加，马上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5月6日开始，港英当局加强对行人的盘查，凡没有证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实属于偷渡后，立即遣返。

这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总理对此作了指示。为了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人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民众返乡。

1962年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港英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民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5月22日至7月8日止，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

邓小平一针见血： 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这次逃港风潮到底逃出多少人？据宝安县外事办的统计，1962年从4月下旬至5月23日，外流出境的总人数约6万人次。据英方宣布：从4月底至9月底，由陆地边境上偷渡过去的约7万人次，最终获得成功的估计约有1.2万人。逃到宝安的有10多万人。

由于大批民众要逃港，很多境外媒体借此妄图制造社会混乱。这次逃港不仅在宝安周边地区引起混乱，而且还波及到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广东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并在一些地区引起骚乱。

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当听到广东省委汇报到宝安一带逃港风时，他敏锐地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此后，宝安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浪潮，经济得到迅猛发展，逃港潮也很快消散。

（摘自《新疆都市报》）

文学助推美苏关系



1988年里根访问苏联

苏联怎样不再是“罪恶帝国”，苏美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出现和缓转机的？俄罗斯著名诗人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日前发表文章，称这跟美国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有关。

里根曾不止一次称苏联“罪恶帝国”。但这一称谓无疑是悬挂在地球上的一颗潜在原子弹，任其流传实在太冒险了。在总统任期结束之前，里根想试探性地跨出跟苏联和解的第一步。英国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一再劝说他去和苏联新当选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接触。

1988年，里根夫妇访问莫斯科。一直被视为苏联头号敌人的里根和妻子南希在全身心地感受莫斯科人脸上真心欢迎的笑意时，双方的敌对情绪已经有所缓解。最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则发生在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卡尔波夫为里根夫妇访苏所举行的晚宴上。那天参加宴会的还有美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兼当翻译）。

里根在宴会上作了30分钟左右的讲话，其实那是一首对俄罗斯文学的颂歌，这使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十分惊讶。讲话稿无疑是马特洛克这个苏联通起草的。

众人最佩服的是当美国总统在提到俄罗斯那些经典作家和当代作家不下20个姓氏时，居然每次都是脱口而出，没有出过半点差错。

看来他很可能事先同马特洛克做过无数次练习和彩排，但听众还是对他佩服至极，称赞他是个文化素养极高的总统，因为即使苏联人恐怕也很少有人能准确无误地叫上这些作家的名字。

里根还很懂得演讲艺术，他并不刻意抬高声音，却能根据内容抑扬顿挫，节奏感相当强。而他当天最成功的节目要算朗诵著名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其声音时而犹如大雨来临时的隆隆雷声，时而变成树叶平静下来的簌簌声，一会儿又变成海浪平息后使人昏昏欲睡的沙沙声。里根的朗诵赢得了听众发自内心的热烈掌声，不少人甚至激动得站了起来。

当总统站起身准备离开时，一个别着记者协会证章、身材矮小的男人突然截住了他的去路，声音尖细而带着挖苦地问道：“总统先生，您既然如此崇拜俄罗斯文学，为什么又把我们的国家称作‘罪恶帝国’呢？”

所有在场的人都呆住了。里根略带歉意地笑笑，轻轻拍拍他说：“尽可能把这事忘了吧，我的孩子。”

紧接着里根把声音降到说悄悄话、但又能让周围人听清楚的程度：“我也在尽可能忘掉呢。”就从这句话开始，苏美关系才开始有了和缓的迹象。

（摘自《环球时报》）

谁缴下了冈村宁次的佩刀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馆，收藏着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时向中国呈交战刀后由何应钦指令制作的。

1945年8月15日10时10分，冈村宁次接到了东京发来的关于“天皇陛下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密电，即无条件投降令。

9月2日，冈村宁次向中方提出《有关停战协定之请示事项》（共五条）。其中第一条第二款要求“请允许指挥官携带刀剑返回日本”。中国深明日军以刀剑为精神和魂魄的象征，所以断然拒绝此款，其它照准。9月7日，为筹备受降仪式，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派人正式通知日方，受降仪式上日军代表不准带刀入场。中方的这一要求在实质上等于是照顾了冈村宁次的颜面，冈村宁次自然不愿在众人面前去表演缴械投降这一幕。但中方要求，冈村宁次需将佩刀转交何应钦，以示在华日军的缴械。

1945年9月9日，是值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暨中国战区中国军队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仪式地点确定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内。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国的军事代表和驻华武官应邀出席观摩。中外记者、仪仗队、警卫和工作人员近千人出席。9时整，受降仪

式开始，何应钦主持了仪式。冈村宁次首先出示了日本政府出具的冈村宁次受权投降的证明书。肖毅肃代表何应钦将日本投降书的中文本两份，交给冈村宁次。冈村起立，低头用双手接受后，由小林研墨，他匆匆翻阅降书，然后沉重地提起毛笔，微颤着手迅速地在两份降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中国抗日战争最终以胜利落下了帷幕。

仪式结束后，何应钦派副参谋长冷欣中将携带日军的投降书和冈村宁次呈缴的佩刀由南京飞往重庆，面呈蒋介石，并报告投降签字仪式情况。不久，蒋介石“还都”南京，冈村宁次的佩刀也被重新带至南京，展放在总统府内。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攻占南京，在总统府里搜缴了这件冈村宁次的佩刀。以后，该刀经政务院

（后称国务院）转交国防部。国防部又将该刀交由军械部兵器陈列室陈列。1959年，在军事博物馆征集军事文物之际，总后勤部军械部兵器陈列室将它送交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

（摘自《北方新报》）



冈村宁次接受审判。